

第六章 結 論： 兼論曾國藩對中國近代革命的影響

在探討過曾國藩經世思想的淵源、內涵以及在軍、政面的實踐與評析後，本論文進入結論階段。在論文撰寫的過程中，透過大量的文獻閱讀，就曾國藩經世思想的整理爬梳，逐漸領會出其經世實踐的條理、因果與脈絡。以下乃就前述五章的分析討論以及個人研究歸納，對曾國藩經世實踐乃至對中國近代革命之影響，作如後之總結。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曾國藩經世思想展現的脈絡

曾國藩一生以經世著稱，自本論文第二、三、四章觀之，當知其不僅僅是「坐而言」的理論家，更是「起而行」的實踐家。誠如前數章的討論，在道統的理論奠基下，曾國藩無論在軍、政乃至洋務運動的推展，均是以道統為中心主軸向四方延展，如果循線追索，最後仍然是回到傳統經世思想為主的中心點。但由於人類的思考方式會隨時空的轉折與大環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因此當曾國藩以不同的角色或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以其所抱持的基礎經世理論與理想，所顯現在外的思想與作為，仍是有所分際的。以下乃就內外之別與人生過程中經世思想與實踐之演變加以論述：

一、就內外之別而言

（一）在修身治家方面

總體而言，曾國藩的經世思想表現於對內的修身治家方面，屬於較靜態、內斂與傳統的。自曾國藩生身年代至今已百餘年，儘管對其評判有來自不同角度的褒貶，但曾氏的日記與家書卻是歷久不衰為後世所稱頌的。觀其日記與家書、家訓內涵，數量雖然龐大，卻是一貫謹守中國傳統倫理與禮教的分際。日記中許多內容均涉及對自我修養的約束、要求、反省與改過等；至於家書，除去與諸弟討論軍政部分

外，吾人可見其對於子女與諸弟生活行爲態度之教誨，萬變不離其宗，概以傳統禮教爲依歸。而曾國藩在自我修養與齊家、治學上，更著重實踐的功夫，家訓中總不離自立自強、孝悌仁愛、勤勞節儉、謙虛謹慎等諄諄教誨。自本論文前數章的討論中更見其自身一生謹守分際，不斷的在實踐、檢討與學習中度過。

（二）在領軍從政方面

曾國藩的經世思想表現於對外的領軍從政方面，則屬較爲動態、開放與堅持的，尤以洋務的創新，更成爲中國現代化的先驅。本論文曾一再述及曾國藩乃爲經世實踐主義者，其經世的理想就是要將理論付諸行動，以成果顯現於世，俾能穩定社會、造福大眾。而他在軍政方面的作爲，於咸豐二年組辦團練之前，雖一路高升，然因職務執掌所限，難有突破性之表現。因此誠如本論文第四章第三節所言「時事造英雄」，社會的動盪與滿清的衰敗造就了洪秀全的崛起，而洪秀全太平軍的起義又成就了曾國藩的經國大業、千秋功名。洪秀全敢於率領起義，固然勇氣可佳，而曾國藩同樣敢於以文人領軍平亂，其忠於禮教、固守傳統之氣節更是可敬。在領軍平亂時，對於軍隊的組織、幕僚團隊的援引、戰略戰術的運用以至於西洋武器裝備的引進，以及而後的各項洋務興辦與西洋文化的學習等，所具之遠見，以當時代而言，確是高瞻遠矚、活躍開放之舉，也爲清朝以往封閉自負的政局打開一條活路。

當然，在這種動態開放的舉措之下，即如本論文在第四章第三節中所述，其背後護衛傳統文化的堅持，可能即爲其經世理念的侷限，更可能成爲其經世作爲得以登峰的牽絆，否則以曾國藩在當時代所表現出來的智慧而言，或許中國現代化的腳步能更加速或更跨越。

二、就人生過程而言

（一）科舉入仕之前

在第二章與第四章的論述中，吾人可清楚的回溯出曾國藩在科舉入仕之前，身受庭訓的鞭策與大環境對仕子的期望，以及在層層疊進的求學過程中，在四書五經傳統儒家以及諸子百家浩瀚的學問中，所

領悟到經世的概念，尤以在漣濱書院讀書時，初悟人生經世目標為甚。然而入仕從政為實踐經世之途，科考又為入仕從政之前提，因此在祖訓的期盼，大環境要求必須科考方能入仕的體制，以及湖湘文化所具「堅持」的特性影響下，此時期曾國藩實踐經世最大的目標就是努力治學、科舉中第。

（二）進京為官之時

曾國藩二十七歲時中進士入翰林院，成為人人稱羨的焦點。然如前述，雖一路高升，由於職務執掌所限，在經世作為上難於有突破性之表現。此時期他的經世思想內涵由於請益於唐鑒、倭仁等著名理學家，以程朱理學為主體，將學問與修養緊密聯繫，並以治國平天下為最終目標，可說是他個人修養功夫達於尖峰時期。值得一提的是，此時期他在「靜」的功夫修養與獲得上達於顛峰，於「靜」中得以體悟出「定見」、「定識」與「定力」。也因此得以培養出「堅忍堅持」與「穩中求勝」的人格特質，對其而後領軍作戰的戰略戰術運用方面，當深具影響力。

（三）領軍作戰之際

如第三章中所言，曾國藩願意以文人之身領軍作戰，一為根深蒂固的維護道統的使命，另一項重大的推力，則為得以實現其長久以來治國平天下的經世目標。

此時期，一方面吾人得以見到曾國藩的戰功彪炳，另一方面便是頗受爭議的殺戮行為。本論文中一再論及，大環境的需求以及身分與職務變化，會影響個人的決策。實際上曾國藩經世目標始終如一，所不同的是其身負平亂重任，而社會形勢嚴峻險惡，以當時代之執法觀念，亂世用重典乃理所當然。尚且吾人當標榜的應是他以治學所獲，用之於治軍，無論在軍制、裝備、管理、戰略戰術方面，所獲得的勝利，絕對是其經世理念上，精心經營的戰果與無怨無悔付出的回饋。

（四）平亂裁軍之後

曾國藩在平亂上的功勳，使得清廷既喜且驚。基於長久以來存在的「滿漢猜忌」，清廷的表現與言語，激發曾國藩潛在的危機意識，領悟到不能一味的過於自信、冒進，應見好就收、適時退讓。因此他儘

量淡化自己的光環，避免鋒芒過露，並將功勞歸之於部將與友軍，加以湘軍內部因時日愈久，益趨腐化，因而毅然裁軍。此時期曾國藩將經世理念重點置於治學與洋務，重刻《船山遺書》、恢復鄉試、專心地方政務，更重要的是全力倡導洋務。推展中國早期的軍工業、譯書、育才等事宜，均於此時期推動執行。經世作爲的重點由軍再度轉而爲文，成爲中國現代化的先鋒之一。實踐之成效，一方面贏得世人的稱讚，一方面也安然渡過危機四伏險惡的政治環境。

貳、曾國藩經世實踐在當時之意義

嘗見有人對歷史人物以功過論斷，然筆者以爲如就單一事件而言，或許可以褒貶其因果與執行過程，但對於整體的評斷，由於許多作爲事實上是互爲因果、環環相連的，如果非要有功過之分，實際上很難將各種情境加以區隔。猶如董叢林接受訪談所言「對歷史人物的評論似無法也不應追求答案上的唯一」，因此仍是回到本論文所一再強調的，要以當時的環境需求來看歷史人物才較公平。歸納曾國藩的經世實踐在當時的意義，略述如後：

一、忠實守成

接續前述董叢林的論點，他認爲曾國藩「身處過渡性時代，思想行爲表現偏重于傳統和正統，但不是懵懂和拘泥地執守，帶有某些趨新傾向。」在本論文前幾章的討論中，吾人亦當體會到曾國藩在修身、齊家的功夫上，是絕然的傳統與保守。其修身與治家方法頗爲後世所稱道、借鑒和學習，而治學之堅持，更足爲後世之典範，幾乎伴隨其整個人生。由於勤奮治學，曾國藩留有大量著述，也由於勤奮治學，不論是從軍前亦或從軍後，均一本讀書人之堅持，手不釋卷，即便邁入老年時，視力下降，而後又致右眼全盲，加上眩暈、胃痛等症狀，仍然不廢閱讀，直至辭世前一天，仍在日記中怨恨自己學業無成。曾國藩對治學偏重於傳統與正統，但在傳統治學內涵的守成中，他是具有突破性與創新性的，洋務的學習與推動，便是融合了個性與智慧的結晶。

值得注意的是，從本論文第四章表 4-1 中可見，曾國藩於道光十八年中進士，年方二十八歲，便得以點翰林入閣拜相。受到其恩師軍機大臣穆彰阿的提攜固然是關鍵原因，而其以一漢人之身，能得此榮寵而至封侯拜相，權傾一時，又在滿漢猜忌的氛圍下，適切掌握時機，運用智慧全身而退，其在官場的守成力亦不容忽視。另一方面，曾國藩以辦團練起家，團練乃為民間對抗遊民土匪用以自衛的武力，因此沒有官場氣息，更保有地方人民的忠誠。以鄉土的忠誠輔以孔孟的信念，因此在精神上，曾國藩帶領的湘軍是一支重視倫理，以儒家禮教為基礎的互助團隊。

以上所述，乃消極面的守成，然而不可忽視的積極面的守成，是曾國藩在當時代願意領軍平亂的目的，乃是為了要恢復社會經濟、穩定社會秩序，是具有經世濟民積極經世意義的。在太平軍以狂飆之勢席捲大半個中國時，社會長期處於戰亂之中，不僅不利於社會發展，對於人民的生存更是極大的威脅。曾國藩在儒家經典的「以理經世」及「以禮經世」的深厚傳統思維的驅動下，為了保守人民的安定，挽救社會民生於危機之瀕，跳脫滿漢情結而成就其中興大業，在當時而言，功勳是不容忽視與抹滅的。

二、發展創新

層層關鍵的創新，是曾國藩成功的核心動力。曾國藩在治學的守成上，畢生服膺程朱理學，雖主兼取各家之長，認為義理、辭章、考據、經濟四者不可缺一，但仍將理學放在首要地位。而曾國藩在理學的創新層次上，乃將理學用之於經世，將「理」具體化而為「禮」，在其心中的道德與行事中樞，就是儒家傳統的「禮」。而曾國藩在治學上將「經濟」與義理、辭章、考據並列，成為其理學經世的獨到之處，這也是他在鴉片戰爭外力入侵的情況下，能敏銳的省悟到應推動洋務、學習西化的思想基礎，因而積極的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與文化，並開啓派遣留學生的先河。此外，秉持儒家「措之天下、潤澤斯民」的經世目的與湖湘文化的經世精神，他將此傳承的經世理念付諸實

踐。除了能夠正視現實，勇於諫言，更將經世致用從注重民生吏治的實務和關注抵禦西方列強侵略的夷務，推展到自立自強的洋務上，使洋務從學術層面的學習，發展成大規模實踐的新氣象。因此理學的創新，觸動了曾國藩推展洋務的概念，這種思想觀念，突破了「夷夏之防」的傳統觀念防線，而洋務實踐的創新，更帶動了中國近代化巨輪的轉動。曾國藩將洋務與時代發展相結合，賦予時代發展全新的內涵，在近代中國發展史上佔有不容忽視的角色與地位。

軍事的創新，是湘軍武力的支撐。改革有別於陳腐的綠營軍制，以嶄新的募兵方法以及儒將帶兵的模式，都是前所未見而臻於成功的楷模。此外，水師的創新、輪船的製造，為清朝長久以來以陸師為主的軍制帶來新氣象，更令吾人不得不佩服曾國藩超乎常人的智慧與遠見。而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焦點，乃為曾國藩的用人哲學，創建中國史上空前龐大的幕僚群與異於以往的職司內涵，在當時代而言，是幕僚組織與制度的創新，集眾人之智慧補一己之短，誠為曾國藩成功的關鍵所在。

三、精英典範

曾國藩之所以能將其經世思想付諸實踐，除了因緣於傳統儒家經世思想的植根外，旺盛的企圖心與人生的機緣，提供了實踐的平台。然而在複雜的官場與戰場上能全身而退且得保晚節，則歸功於其敏銳的觀察力與過人的智慧。他在功高震主之時，能淡化自己的光環，更能毅然的裁撤湘軍，安渡危機四伏的險惡環境。即便當時代人對其褒貶不一，然誠如本論文中所述，曾國藩是站在維護傳統「名教」的立場，摒棄族群的偏見，以維持人倫道德與社會秩序為目標。因此其秉持「忠義誠信」、「行政中立」之準則，作為從政領軍的道德標準中，隱含有凜然之氣，足堪為今日政府高級文官之典範；其善用人才，勇於實踐，也因此才足以成為湖湘文化的代表之一，更成為湖南人的驕傲；他以天下為己任，敢於身先士卒的精神，對湖南甚至整個近代中

國都有重大的影響，堪稱為晚清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Charisma）¹，有精神領導的作用。正因此，現今湖南省雙峰縣對於曾國藩故居「富厚堂」盡全力維護，成為中國大陸保存最完整的鄉間侯府。1996年被公佈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3月29日更被列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叁、曾國藩經世實踐對現代之啓示

曾國藩經世思想的實踐面，除了嚴謹的修身治家之法外，以平定太平天國及興辦洋務最為後人所稱道。自現代之觀點視之，以下數點頗值借鑒與稱頌。

一、倫理道德的典範

從本論文第一至第五章的論述中，當可發現曾國藩的經世思想最不具爭議的部分，便是其修身治家的思想與做法。他的經世目標在於治國、平天下，而值得稱頌的是他在治國、平天下的基礎面，也就是修身、治家的功夫上，無論是對自我或對家人，都是嚴格要求、確實執行。尤其是其治家倫理，足資為現今社會風氣之典範，或許部分內涵以現代而言需有所更新，但在方式與意義上基本是相同的。

家庭為社會穩定之根基，無以齊家，何以治國。在本論文中，吾人可見曾國藩除了在自我修持方面恪遵傳統倫理與祖訓教誨，對家人與子弟的要求同樣一絲不苟。曾氏認為嚴謹的家訓和淳樸的家風能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環境，因而有諸多膾炙人口的治家口訣。在前數章的討論中，均可見其經年以大量的家書期勉家人，筆者參訪其故居時，又可見其故居中處處充滿發人深省的教誨，當知其乃身教與言教並

¹ Charisma 原意為「神聖的天賦」，來自早期基督教，初時指得有神助的超常人物。韋伯（Max Weber）在分析各種權威時將它的含義引申並賦予新意，用它指富於創新精神人物的某些非凡素質。在劇變的社會中，這種創新的人才，得以發揮力量，建立或影響政治與社會體系。無論工業社會或過渡社會，甚至傳統社會的許多制度，都是由這種具創新領導特質的人才的帶領，經過日常化的過程（Process of routinization）逐漸發展而成的。

參考：1、王雲五總編輯，龍冠海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社會學》，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年，頁142-143。

2、<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isma>

重。大至對外的做人處事，小至對內的誠敬勤儉、孝友恭謹，甚或女眷的紡織烹煮與婦德教育均勤加叮囑。此心此情，足堪為後世警醒與效法。

反觀今日，社會與家庭觀念似有日趨低靡之勢；對傳統倫理道德的價值觀亦有日漸消散之勢；層出不窮的社會案件令人怵目驚心，這是脫離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的負面反映。但即便時代的發展不容回頭，對於中國優良的傳統倫理思想教育，當政者與為人家長者應亟思挽救。《三字經》中有言：「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倫理道德觀念的培養非一蹴可成，幼童的倫理思想教育、家人鄰里同儕相處的模式，在在於心靈深處刻畫示範。或見許多父母、子女、兄弟之間日趨淡薄的情感，在看到曾國藩如是深厚的倫理道德教育根基，當深自警醒，體認家庭鄰里的安定穩固，方為社會國家之福。

二、善於處事的智慧

曾國藩表現在從政領軍上的智慧無庸置疑，即以其善於審時度勢而言，無論是在朝為官建立典章制度、關注農民生活、推動洋務的興辦，或是敢為天下先而決意組建團練、軍制的改革、幕僚的調度以及戰略戰術的運用，在在表現出過人的勇氣與智慧。於此將勇氣與智慧並提，實乃因以當時內憂外患夾擊的環境下，必須有勇氣才得以施展智慧，因此善於審時度勢也是曾國藩表現於動態的外在智慧的根源。

然而更值得吾人學習與讚頌者，當為其將善於審時度勢表現於處事方面的靜態性智慧。自前數章之討論中，可見到曾國藩在人生高潮、事業巔峰的狀態下，毅然裁軍，歸諸平淡。所表現出知所進退、隱晦光芒的修為，如非有透徹的頓悟，實難就此安於現實。而吾人看到他因善於用人，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除了能藉此作為傳播的媒介外，曾氏的詩文、奏摺，實則也都成為他招攬人才、建立名聲的靜態性傳播媒介。以智慧為基，以博學為輔，使得他的詩文與奏摺名聞天下，有識之士紛紛投入其幕府之中。於此曾有野史記載，許多新科進士不願意赴朝履新，而願意進入曾氏兩江總督的幕府。眾志成城，有強力的幕僚群，不同面向的各路人才，曾國藩才能以儒生之身，為蒼生作護

衛、作創新，也才能成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三、種族主義（racism）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衡量

在中國內部而言，有滿、漢、蒙及各少數民族的分野。由於漢人長期以來的強勢與優越感，以及大部分朝代以漢人當家的傳統承襲下，漢族成爲理所當然的正統族群。也因此，當元朝與清朝以異族入關統馭天下時，漢族將之視爲莫大的羞恥與悲憤。明末清初的反清復明思潮以及若干經世大家如王船山等之抵抗，使清初社會中瀰漫著強烈的民族思想。在本論文第二章陳述王船山對曾國藩的啓發中，僅述及儒家道統思想與治國用兵方略，至於王船山強烈的民族思想，似已被曾國藩重心向外，學習洋務以護衛中國的種族主義取代了。第四章第二節亦述及宋明理學家較重視文化的民族思想，而忽略血統的民族思想之情形，也影響到曾國藩華夷之辨的淡化。對此情況，如就當時代的環境背景加以分析，應可釋疑。

曾國藩出生於 1811 年，距清朝 1644 年入關已百餘年，而清朝在 1842 年鴉片戰後，便開始面臨內亂外患交煎的窘境。太平天國雖然師出有名，卻是藉扭曲教義的洋教，破壞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看在曾國藩維護禮教的立場上，自是難容，而西方列強的欺凌，更令中國瀕於滅種的危機中。在民族尊嚴與種族存亡的雙重壓力下，曾國藩選擇了先保中國免於種族滅亡的立場，在外交上力主和戎，再學習洋務以圖自強，避免中國淪爲西方列強殖民的厄運。也因曾國藩選擇先保種族不亡的立場，乃以護衛傳統文化爲名「討洪靖亂」。然而此舉看在滿漢區隔強烈的民族主義者眼中，自是另有一番爭議與評論。

四、與世界同步的遠見

曾國藩對洋務的推動，企圖使中國在軍備科技上能趕上世界列強的觀念，以今日而言，即爲「全球化」(globalization) 的概念。「全球化」應是二十世紀以來，最普遍最熱門的名詞，從 1980 年代末期開始，「全球化」即成爲社會科學關注的焦點。由於科技與資訊的發達，世界已漸趨同質性而成爲一個相互關聯、沒有距離的共同體。而曾國藩

在當時代的遠見頗值吾人深思，以當時清朝長期處於封閉鎖國的年代，同時又以中國人的優越自豪於周邊列國，曾國藩能在如此環境下為西洋的侵略警醒，且能思及向對方學習俾與之抗衡，不畏反對之勇氣與智慧實不容抹煞。儘管其中不可避免的具有消極因素，如西化的背後實為對傳統文化的固守，然於學習西洋科技之外，實則已自各領域的書籍翻譯中，邁向學術文化面的學習與發展，以當時代來講，已是走在時代尖端之理念與做法，具有要與世界齊頭而非尾隨的觀念。再細思之，這也正是今日國家建設需要記取的警訓，在強調發展本土化的同時，於科技、經濟、政治乃至文化各方面更應跟隨潮流、跨越國界，也就是要順應時代的腳步，追隨「全球化」的熱潮。其中特別應注重的，又以教育問題為先，要能培養人才與留住人才。不只是科技、軍事、經濟、政治等領域，在外交人才的培育上，尤應列為重點。應適切發展培育專業外交人才的搖籃，培養國人宏觀的國際視野，方能順利邁向與世界同步之路。

肆、對中國近代革命之影響

在曾國藩之後，中國發生了一場重大的辛亥革命，取代了滿清，建立中華民國，改變了近代中國的命運與地位。

在辛亥革命之前，曾國藩是唯一有能力取代清帝的漢人，但在前述種族主義觀念大於民族主義的基礎下，曾國藩選擇了護衛傳統文化，也就是對中華道統的維護。他無法忍受洪秀全污衊孔孟、破壞文物、搗毀廟宇的行徑，同時也為了護衛家鄉的安全與穩定而選擇了討洪，更為了中華民族的存亡，而選擇「和戎」以便伺機發展洋務，確保中華民族能立足於世界。當然，在成功的殲滅太平軍之後，曾國藩勢高權重，確實可順勢取清帝而代之，然而當時曾氏除了體弱多病外，實則未具革命的目標。吾人見到孫中山具有實現西方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理想，即便是洪秀全也有著一套類似共產主義，包含政、軍、社會變革的天朝統領制度，但曾國藩在致力於推展洋務的創新外，似未具任何一種有別於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變革思想，他所要求的是能維護大中華的屹立，免於亡國滅種。如果當年曾國藩趁勢推翻清帝，

結果應也僅止於「反清復明」式的漢人奪權，成爲另一位漢人皇帝，而非如辛亥革命所具建立另一種意識形態國體的目標。

然則雖然曾國藩本身未具革命思想，其所遺留的典範，配合歷史對文化發展的自然推動趨勢，對於而後的革命運動，是否具有潛在的或直接的影響力，頗值吾人細加推敲。

一、就文化發展層次而論

在本論文第一章中，曾論及無論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蘊含表層文化與深層文化兩個層次。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與融合，是沿著表層漸入深層，循序漸進的。依此而言，學習西洋的船堅砲利、軍事科技，曾國藩時代屬之；學習民主、憲政、議會制度，孫中山時代屬之。學習西化從表層漸及深層，此二人可說是中國現代化不同層次的代表人物。

在第五章第二節中曾述及，清末維新立憲與孫中山革命，均源於自強運動失敗的刺激，而追本溯源，自強運動實乃發端於曾國藩對洋務運動的興辦。由於曾國藩對洋務的遠見，開啓了中國學習西化的腳步，深入的接觸後，漸進於康有爲等維新立憲的制度層面之學習，而當一切的改革都落空時，學習層面也已進入到意識型態思想行爲的深層部分。孫中山適逢其時，改革不成，革命的思想種因適時而生，因此就時空背景而言，孫中山革命思想乃從 1885 年中法戰役開始，1894 年 11 月 24 日，在太平洋夏威夷群島中的檀香山成立了興中會，是近代中國第一個以「創立民國」爲目標的革命組織，時間距曾國藩 1872 年去世僅相隔一、二十年。因此就文化學習的層次而言，曾國藩確可說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發軔之肇始。

二、就舉事的出發點而論

曾國藩身受中國儒家傳統禮教侷限，身居要職，看見政府沒落，所想到的是改革而非革命，正如第四章第三節所引述 Max Weber 在 *Religions of China* 中所言「儒家的理性主義是對世界的合理適應」，因此曾撰述許多爲民請命的奏摺，出發點乃是爲百姓蒼生而爲。孫中山受西洋教育，具有西方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觀念，看到清政府

的腐敗、專制，且歷經數次改革不成，便思推翻以茲重建。²

在中國歷史上，改變統治者的方式通常有二種，一為禪讓，一為革命。曾國藩不具改變統治者的意念，因此執意平息內亂，創意革新；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則帶有強烈滿漢之分的民族意識，因而在革新不成後，改求革命。太平天國的洪楊起義，猶如孫中山革命的初衷，站在今日民主思潮的立場觀之，勇氣與出發點都值得嘉許，然而洪秀全錯在迫害中國傳統文化，引入西洋教派，卻又竄改教義內涵，令中西道統人士都難以認同。這點看在接受傳統儒學教化的曾國藩眼中又豈能忍受，爲了中華文化，討伐洪楊也勢在必行。

然以孫中山革命時所持「民族主義」的觀點反觀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的舉動，卻是另一種反叛，原因是孫中山乃是爲反對滿清而革命，是以劃清滿漢界限爲號召。在孫中山的言論中，認爲太平天國之所以不能成功，乃因漢人不知自相維持，而漢人不知自相維持，則是由於全國漢人不明白滿漢的界限，而對於曾國藩的討伐洪楊，孫中山批評其爲「爲盜作僕、自忘同胞」。上述的言論是孫中山於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廣州對國民黨黨員演講的內容及民國前一年所發佈的〈軍政府大總統布告同胞文〉中所述。

基此，有必要對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背景稍作探討。首先，其所受到中西合併教育面的影響不可忽視。以西洋教育論之，孫中山由於兄長的關係，得以長期在海外受教，親身體驗到西方的文明以及民主思潮，看到滿清末年列強的壓迫以及中國的腐敗落後，深感清政府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加以其所研讀西方的政治、軍事、歷史等書籍，在在啓發他要推翻滿清，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另一方面，他自幼也曾

² 孫中山的民族思想內涵，隨著不同時期而有不同的堅持。在革命前，並無強烈的滿漢之分，而是亟思改革；然於 1894 年 6 月上書李鴻章失敗之後，於改採革命手段時，將強烈的「滿漢情結」作爲號召口號；民國成立後，爲了國家統一，改提出「五族共和」；而後因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並不僅止於「漢滿蒙回藏」五族，又再提出以漢族爲核心，各民族要同化爲「中華民族」。因此朱宏源稱「民族主義」在孫中山的運用策略上，具備高度的「工具理性」。但歸根節底，孫中山真正的焦點乃在於維護中國的命運與存亡，他的民族主義應可稱爲「國家主義」或「救國主義」。參閱：

- 1、朱宏源，〈再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 年第 22 期，頁 329-336、351-355。
- 2、朱宏源，〈孫中山對內民族主義的轉折與困惑〉，《滿族文化》，1991 年第 15 期，頁 5-9。

受過私塾教育，而其授業教師乃為太平天國中人，又有一太平軍殘留之老軍人，亦常往孰中攀談。據胡漢民所著《總理事略》中記載，孫中山與此老軍人相交甚篤，常述及當年之戰爭與洪秀全之為人：

興之所致，輒以洪秀全第二勉先生，先生得此徽號，視為無上光榮，亦慨然以洪秀全自居。

另一個影響因素，則因洪秀全與孫中山同為廣東人，洪秀全的事蹟一向為廣東人所津津樂道，因此同鄉的影響力在當時代的氛圍下，多少也有影響力，³此情與曾國藩成為湖南人的驕傲同理。也因此吳雁南、馮祖貽、蘇中立主編之《清末社會思潮》中，闡述太平天國的革命精神，實則貫穿著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的論點。

在中國農民起義的戰史中，洪秀全是唯一建立起一整套革命理論的人，集結以往農民起義的經驗、教訓與自身的觀點，提出政治、經濟、民族、男女四大平等主張。整個太平軍具有嚴密的組織與紀律，建都天京之後所提出的《天朝田畝制度》，雖類似今日之共產制度，然在當時乃為革命史上的創舉，受到許多農民的擁戴。最後仍告失敗的原因，一方面因為戰略上的錯誤，另一方面則係因定都天京之後，陷於紙醉金迷、宴安鴆毒的奢華局面，使得領導集團的核心開始爭權奪利，產生質變，終告失敗。

孫中山曾自詡為洪秀全第二，實乃是站在滿漢之分的「民族主義」立場上。因此當知，曾國藩討伐洪楊與孫中山革命立場的出發點完全相反，但如若以太平天國宣揚異教、詆毀孔孟、焚燒廟宇宗祠的動亂之舉詢之，想必也不是孫中山所樂見的。張玉法在《清季的革命團體》中陳述孫中山的革命「部分是受十八、九世紀西方政治思潮和革命運動的影響，部分則由傳統思想和當時的政治、社會及國際環境所造成」。當知實際上清朝之滅亡，除了政治的腐敗、滿漢的爭議，尚有其他社會經濟因素的蕭條、人民對於改革不成的失望因素，以及滿清政府不斷的對外屈服引發的民族危機，類此均為其加速敗亡的原因。

³ 朱宏源，〈孫中山對內民族主義的轉折與困惑〉，頁 5。

第二節 研究檢討

壹、就分析架構而言

本論文的分析架構，從曾國藩經世思想的淵源、內涵，再就其內涵之基礎貫注於治軍、從政，尤以洋務倡導的實踐面作論述分析。在每一章中，均就其思想、實踐之序論述，再依其思想與實踐之性質，作總體評析。在分析架構的層次中，可清晰見其因果關係，因此常於文內看到引用前面章節內容以為佐證。

如純就曾國藩經世思想內容而言，實際上涵蓋範圍甚廣，因此本論文乃置重點於其在道統與洋務交織下的經世實踐為主，即以儒道治軍以及從政治績與洋務之推動為論述重點，據以評析其中所蘊含之經世特性。至於對文化學習層次的呼應，可從第三、四章論述領軍、從政與洋務的實踐中，看到曾氏在器物層面及學術文化的學習；第五章對政、經、軍、社的影響，則為制度層面的探討；而思想層面的探究則於本章第一節兼論對近代革命的影響中可見之。

另於曾國藩各項經世作為個別內涵的詳盡析論，筆者將列入爾後系列研究項目，逐一深入分析探討，以求對於曾國藩的經世思想體系的研究更臻縝密詳實。

貳、就資料運用而言

研究架構是論文的骨幹，參考資料則如細胞、血液與皮肉。資料愈詳實、愈充分，論文的形體愈清晰、愈周延。近年有關曾國藩的研究資料甚豐，對於各家說法之取材與考證方面，筆者乃以最基本且完整的岳麓書社 1994 年版《曾國藩全集》30 冊為考證依據，輔以漢苑出版社 1976 年版《曾國藩全集》、曾國藩原著之《求闕齋日記類鈔》及台灣出版之曾氏手寫稿影本《湘鄉曾氏文獻》與《曾文正公手寫日記》。凡涉及曾國藩的日記、家書、奏摺、詩文或書信所論及之事件或言論，必定引述原文內容為據，如遇出處不明之論述，則雖覺可貴，但仍予放棄。而為了有更清晰的一手佐證資料，筆者於兩岸收藏曾國藩遺跡之處所均有所獲，詳細內容已如第一章文獻回顧中所述，包含

湘軍內部原件資料照片、奏摺原件複製本以及曾國藩故居中可資引證的匾額照片。其餘足資參考之一手資料，尚有有曾紀澤之《曾紀澤遺集》、《曾惠敏公手寫日記》；倭仁之《倭文端公遺書》；薛福成之《庸菴文編》；曾國荃之《曾國荃全集》等。雖然筆者在撰寫的過程中，一再警惕自我，研究歷史人物與事件，必定要以當時代之情境為依歸，客觀據實分析。然筆者學能有限，在諸多資料之運用中，必然仍有許多遺漏、不足或失之主觀之處，僅以一誠敬之心態，作為後續研究檢討修正之師。

叁、就研究貢獻而言

以曾國藩為研究主題之著作雖多，然多數集中於其修身、軍事與洋務面之探討，至於以其經世思想為研究主題者，僅見少數單篇一至二萬字之文章，實不足以窺其全貌。然如僅就曾氏之經世思想與實踐面分析，仍覺不足以突顯曾氏經世思想之價值與貢獻，因此本論文由「面」的影響推而及於以時間為代表的「線」以及以人物為重心的「點」。同時將研究重點置於曾國藩經世思想對政治、軍事、經濟及社會面之影響，並以之與近代革命作聯繫，突顯曾國藩經世思想對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影響力以及其對中華文化大環境的實質意義，再進一步及於對現代文官的啓示作用。

由於曾國藩開啓中國現代化之腳步，本論文特就文化學習的「挑戰與回應」理論，檢視洋務運動對中國現代化的推動與影響，並對現代學子有所惕勵。從曾國藩推動洋務的過程視之，可見其發展的層次及深度，自船堅砲利的學習，進一步翻譯西書邁向學術面間接性的實質探討，最後又更進一步推動派遣小留學生赴西洋留學，發展到文化面直接性的實地學習。因此其在文化的學習與融合上，已突破僅限於器物面的學習，而翻譯西書，更是走向學術面的關鍵之所在。誠如第四章圖 4-1 所示，翻譯西書、學習工學科技理論與實務，為曾氏洋務「邁向學術面實質探討的關鍵，製器與育才並重」；派遣留學生更標誌其洋務邁入「文化面直接性的實地學習」。曾國藩顯然已掌握到「文化的本根重於器物」的原則，非如部分學界認為曾、左、李等人不懂

文化層面學習的重要性。

另針對曾國藩改變了中國的命運與發展方向一環，將之與數十年後所發生之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運動，做關聯性探究。就曾氏與孫中山不同之意識型態，在不同文化學習背景下及文化學習遞嬗的層次中所造成不同之結果，推論曾氏對孫中山革命動機的啓發與影響，並在文化學習層次上予以合理化。因此在本論文中，不僅可看到曾國藩帶領中華民族在 19-20 世紀政、軍、經、社各方面腳步的跨越，更可見其魅力延伸及於 20-21 世紀，在民主領域中繼續發光。

肆、就研究困難而言

撰寫本論文所面臨的困難，除了架構之構思、內容之規劃及撰寫頗費心力之外，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資料的蒐整。由於台灣有關於研究曾國藩的文獻有限，大部分資料仍得向大陸地區尋訪，然因工作時間所限，僅能利用每年寒暑假赴大陸數週時間。匆促的造訪，總覺有所不足，然不足中總有貴人相助，此又為撰寫論文中的溫馨畫面。謹將蒐證資料所遇困難陳述如后：

- 一、原版工具書採購不易，部份原版工具書籍出版一段時間後便無再版，造成市面上採購不到的困難，必須花費大量的人力、時間與金錢，方得以獲取該等資料。
- 二、赴湖南圖書館搜尋資料，因部份珍貴一手資料與文獻不准複印，必須以數位相機拍攝，一來拍攝數量有限，二來拍攝效果不如預期，頗覺遺憾。
- 三、因本論文參考資料以大陸出版者居多，許多大陸學術網站，台灣無法註冊，因此也必須麻煩大陸友人幫忙蒐整。一方面替他們增添許多困擾與麻煩；另一方面，總有些許抱憾許多資料無法親自篩選，難免會有部份可資參考的資料因此而疏失遺漏。
- 四、曾國藩故居山路崎嶇難行，2007 年暑假往訪，時間稍嫌匆忙，所幸拍攝到許多珍貴畫面，聊堪稍稍體會曾文正公當年的治家精神與家居環境。

伍、就後續研究而言

本論文乃對於曾國藩之經世思想作一整體性之探討，並將其經世實踐與近代中國現代化相連結作為研究重心。猶如前述，對於曾國藩各項經世作為個別內涵的探討，將列入爾後系列研究項目，逐一深入分析。此外，在第一章「文獻回顧」中述及曾國藩所遺少部分手迹資料，由其家人帶至台灣。該部分之日記、書札等手稿，乃係由曾寶蓀、曾約農姐弟於 1951 年帶至台灣，1965 年由台灣學生書局集結其中大部分出版發行《曾文正公手寫日記》、《曾惠敏公手寫日記》及《湘鄉曾氏文獻》等三部書籍。1972 年，曾氏姐弟因年事已高，乃將該批手稿文獻寄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筆者擬利用公餘假期，赴故宮博物院陸續比對尚未收錄於該三部套書中之文件手稿，期能使曾公之文獻能以更完整之面貌呈現於世。由於此項工作繁重，恐將耗費一段相當時日方得完成，但筆者以為此項工作頗具意義，且對於筆者所研究曾公之經世思想與實踐當更有助益，因之此項任務亦當列為後續研究重點項目之一。

另近期湖南省電視台正籌畫拍攝「曾國藩商戰十二年」影集，自 1861 年曾氏設立「安慶內軍械所」起至 1872 年逝世為止，內容計分白銀戰、茶葉戰、絲綢戰、棉紗戰、交通戰、通信戰、海關戰、金融戰、傳教戰、條約戰及人才戰等十一項。為了能在曾國藩的經世研究上更精進、更深入，筆者也擬於該劇資料蒐整工作上的積極參與，列為後續研究重點。

